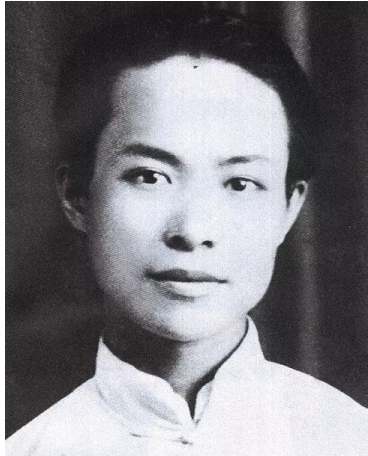


到今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3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如同屈原与汨罗江，彼此成就，互为映照。而在湘西，沅陵又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既是沈从文躲避战乱时的栖居之所，又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更是他精神世界中的“第二故乡”。

沅陵这座临水山城深深滋养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而沈从文则通过接地气的文字将沅陵从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承载人性美与生命哲思的文学符号。从《湘行散记》的沅水风物到《边城》背后的精神原型，从战乱时期的“芸庐”生活到晚年对沅陵的深情回望，我们都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创作脉络：沅陵不仅是沈从文观察社会的窗口，更是他安顿心灵的港湾，是他对抗现代性异化的诗意栖居地。



青年沈从文。（资料照片）



沅江沅陵县段，建于清代的龙吟塔伫立在合掌洲（今名河涨洲）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不是故乡恰似故乡

——在沈从文作品中读沅陵

刘晓

2. 山河如画

沈从文对沅陵的文学描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在他笔下，沅陵的美既来自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也源于与之和谐共生的人文风貌。在《沅陵的人》中，他如此描绘初到沅陵的视觉冲击：“外来人到河码头渡船边时，不免十分惊讶，好一片水！好一座小小山城！”简短的两句话，通过“水”与“山城”的意象并置，勾勒出沅陵作为山水之城的基本轮廓。

沈从文特别擅长捕捉沅陵水景的光影变化和动态美感。在《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中，他写道：“一切光，一切声音，到这时节已

为黑夜所抚慰而安静了，只有水面上那一分红光与那一派声音。”这种对水面光影和声音的细腻观察，体现了沈从文作为文学家的敏锐感知力。沅水在沈从文笔下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充满灵性的存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河流元素，经过沈从文的情感投射和艺术加工，都成为承载复杂生命体验的意象。

沈从文对沅陵的人文景观也有独到刻画。他笔下的“合掌洲”——“沅陵县沿河下游四里路远近，河中心有个洲岛，周围高山四合，名‘合掌洲’，名目与情景相称”——既是地理实指，又因其独特的形态和名字而被赋

3. 水边智者

他开始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在“芸庐”居住期间，沈从文创作了《长河》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以沅陵为直接背景，但其中对湘西社会变迁的思考、对人性美的讴歌，得益于他在沅陵的生活积累和观察。

沅陵的生活为沈从文提供了观察社会变迁的特殊视角。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沅陵，这座原本相对封闭的小城一时间

4. 悠悠乡愁

说，总给人一种远离尘嚣、脱离世俗的感觉。而那些生存在他作品里的小人物又让我们觉得如此亲近。”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正是因为沈从文将沅陵等湘西小城理想化为现代文明侵蚀前的纯净世界，一个保留人性本真状态的精神家园。

沅水作为屈原行吟之地，本身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多次将自我与屈原并置：“这样的沅水，这样的清浊之辩，是屈原与沅水的光和同尘。”通过这种联系，沈从文将自己的沅陵叙事纳入楚辞开创的文学传统，赋予其更深远的文化内涵。从个人情感角度，沅陵是沈从文存放记忆与情感的重要场所。在《湘行散记·老伴》中，他写道：“过去的，有谁能拦住不让它过去？又有谁能制止不许它再来？”这种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感伤，使沅陵成为沈从文文学中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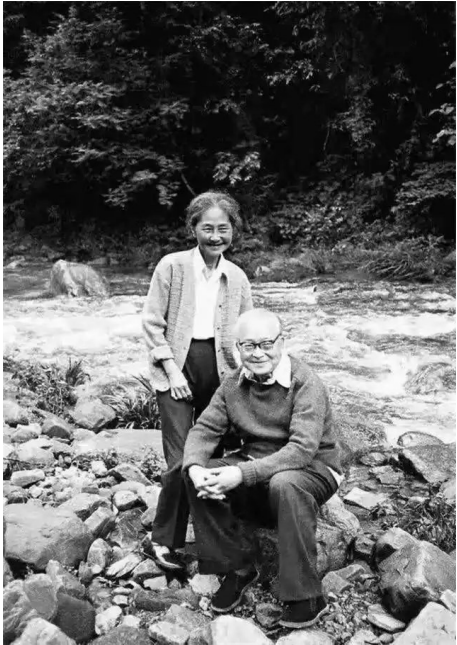
予某种象征意味。龙兴讲寺的红墙、沿河而建的吊脚楼、河街上的商铺等沅陵标志性建筑，都在沈从文作品中留下印记。

尤为珍贵的是，沈从文通过对沅陵日常场景的描写，展现了湘西特有的生活美学。他在《湘行散记·滩上挣扎》中写道：“他用尊敬和爱郑重地书写着石滩上行走的拉船人，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这种对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尊重，使沈从文的沅陵叙事超越了单纯的风物描写，上升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层面。

成为各种文化交汇的场所。沈从文有机会接触和观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沅陵的各界人士，这种观察使沈从文的创作具备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宏大。沅陵的生活还影响了沈从文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表达方式。沅水流域多民族杂居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培养了沈从文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态度；沅陵民间艺术如龙舟竞渡、傩戏表演等，丰富了沈从文的艺术感受力。

充满私人情感的记忆场域。

沈从文笔下的沅陵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经典的地域意象，重读沈从文关于沅陵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可贵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沈从文在沅陵观察到的那些“忠实庄严的生活”姿态，他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尊重和理解，他对人性美的坚定信念，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在《湘行散记·老伴》中，沈从文写道：“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这种惆怅源于对逝去美好的感伤，但也蕴含着对永恒价值的坚守。沅陵在沈从文作品中，正是这种永恒价值的象征——那里有最本真的人性，有最朴素的生活智慧，有最纯粹的自然之美。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沈从文的沅陵叙事，不仅是一次文学之旅，更是一场精神还乡。



1982年5月，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张家界金鞭溪留影。（资料照片）

我俩双手接过照片说：“谢谢沈老的关怀、厚爱。”然后，又向沈老深情地一鞠躬。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步入京城充满节日人间烟火味的街衢，回眸瞻望沈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斯人仙逝，山高水长。

在沈从文家里做客

黄润秋

最难忘金鸡年（1982年）临近除夕，飘飘洒洒的瑞雪给北京披上一层银装。清晨七时许，我和文友李亦明因在春节期间有采访任务，从湖南抵达北京，顾不上吃早餐，我们冒着冷冽的寒风直奔东大街沈从文的寓所。

“湖南家乡来客人了。”迎接我们的是沈老的贤妻张兆和，她身材清瘦，面容温和，眼神亲切。随即，一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长者走了出来。

我们握着沈老温暖、柔和的右手，自我介绍：“我们是担任长沙客运段春运新闻报道的‘土记者’（即党报骨干通讯员），带着湖南省作协给您的亲笔信，专程来拜访您和张老。”

“啊，你们是来自湖南的客人，快进屋，外面寒冷。”沈老拉着我们在屋里藤椅上坐下。

慈祥的张老为我俩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湘茶。沈老关切地说：“记得在热茶里加点滴。”

说着，沈老接过我们的采访本，很快写下“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的字迹，又笑吟吟地说：“我刚满八十，应该是喜寿之时；马上又是除夕，也应是喜年；还遇到来自家乡的文友，可称得上是‘三喜临门’之日。”老人眺望了一下窗外漫天飞雪的苍穹，感慨道，“如今乘车李方便，记得1934年我接到老母亲病重的消息，焦急得一路颠颠簸簸赶路

到常德转乘木船沿着沅江上行。要是那时有了火车，到凤凰该多好呀……”

听到这里，我当即把湘西北将修建石（门）长（沙）铁路的消息告诉他。“到时，我们铁路部门欢迎沈老和张老坐火车回故乡！”

沈老畅笑起来：“越老越想回故乡，人老八十也该叶落归根了。”沈老手抚了一下银鬓，又说，“你们修建石长铁路的线路，我再熟悉不过了。”

这时，李亦明掏出两封信箋交到沈老手中，诚挚地说：“这次我们上京，特地带来了两封湖南省作协作家的信，要面交给您。一封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周健民给您的春节拜年信，另一封是长沙市作协主席杨里昂请您为新创刊的《新创作》杂志题写刊名，顺便带回长沙去。”

沈老笑吟吟地接过双信，一目十行，谈道：“周健民是周立波的儿子，我们是好朋友。《新创作》杂志的题字，已经写好。”转身，他叮嘱张老把题字交到李亦明手中。

室外，纷飞的雪粒拍打着窗上的玻璃，啪啪噼噼直响。屋内，充盈着沈老温馨如春的话语。

沈老心情畅快，话锋颇好，他和张老又从书桌拿下一本装饰精美、图文并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

新中国诞生后，沈从文长期在中国历史

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服饰情有独钟，兴趣盎然。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宴会上说：我们每次到国外去，看到人家国家比我们小，历史比我们短，但是有他们的服装博物馆。我们历史那么悠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部像样的《中国服装史》，我们出国时候可以拿去当礼品，什么时候可以建一个中国丝绸博物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就说：沈从文可以干这个。

从1964年开始，沈从文全身心扑在编著新中国第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的重大项目上，精心筹划编写大书的纲要，对中国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全方位地整理，可谓“工程浩繁，使命如山”。

然而就在即将开印之际，因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批评意见，出版就此搁浅。1981年仲秋，沈从文倾注全部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首次正式出版。

三个小时难忘的时光渐渐过去了，沈老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心意。此刻，沈老又拿出两张照片说：“这是我中年时的两张照片，送给你们留个纪念。”

你好！湖南国保

汤家岗访古

何俊 李世俊



汤家岗遗址出土的夔龙纹白陶盘是我国最早的模印工艺品。 资料图

简介

汤家岗遗址位于常德市安乡县安全乡，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于1977年被发现，面积4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内涵包含了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两个时段，前者时代距今6800—6000年左右，后者距今6000—5300年左右。汤家岗遗址保存完好，功能区分明，墓葬区、生活区、生产区都相对集中，为研究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迁提供了典型实例。

虎渡河畔的汤家岗村，有块约半里路长的岭地，上面只有浅草，没有庄稼。环绕长方形高岭旁的是一条蜿蜒的水沟，将外界隔绝。要不是目睹东南角的一个石碑，谁会想到这就是6800年前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汤家岗遗址。

汤家岗遗址系当地学校教师潘能艳发现。潘能艳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在安乡县文化馆参加过考古培训。1977年夏季，连续下了几场暴雨，汤家岗的抗旱沟有多处被冲垮，泥石流处裸露着团粒状的烧土、卵石。有一天，潘能艳从沟渠边经过，发现了打磨得光滑的石头，这些石头形状不同，有的像砍砸器，有的像石斧。稍加辨认，他惊喜异常，随即搜集了一袋样品，直奔县里和省里汇报，并很快得到证实：这些石质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78年冬，省博物馆考古队主持试掘，从分为三期的地层中，清理出了石斧、镑、铲、凿、砺石等石器工具；还有盘、盆、碗、罐、釜等红陶、黑陶、白陶器皿，以及泥塑的红陶猴头。早期的白陶盘来自七千年前，质地细腻，颜色白净，花纹精美，似已有模印工艺。

1990年的第二次发掘，考古队清理出陶纺轮、陶豆和陶鼎，还发现了稻谷壳的痕迹。汤家岗遗址是介于皂市下层文化与大溪文化之间的中期晚段文化，具有多种文化标杆性文物，被考古界命名为汤家岗文化。2007年进行的第三次深度发掘则发现了原始人头骨和用于“活人祭”的坛装整体婴儿遗骸；初具城堡雏形的土围壕和部落首领官殿式建筑群遗址……这些说明，汤家岗的先民们已经具有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群体保护意识，开始了向粗放畜牧种植生活方式的过渡。

当笔者走进一株古槐树下歇脚，一只芦燕飞到标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上，小嘴喳喳，尾巴翘翘，还跳着圈儿作舞蹈状。

汤家岗遗址的出土文物，我看过实物。现在我徘徊在遗址，仿佛能通过“时间隧道”，眼前浮现出安乡先民一天的生活图景——

曙光初照，汤家岗现出了零零落落的房屋。仔细一瞧，这些像草垛又像蘑菇状的房屋，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氏族部落里的人，三三两两像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一样。再瞅他们穿的衣服，像是兽皮做的，类似现今的斗篷、裙子的模样。

伴着鸟儿的叫声，男女老幼吃罢野果、干鱼之类简单饭食，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一批男性壮劳力，有的拿了石斧去砍树，有的抬了石铲、石镰去开荒种稻，有的背了石标去打猎；有些掌握了烧窑制陶技术的工匠则在土窑前忙碌。

岗上的土窑大多构造简单，在地面上挖个坑当火膛，上面设置直径一米左右的窑床，周围用草泥筑成圆顶窑室。陶坯放在窑床上，下面烧木柴，即可烧制成陶器，如氏族群体用的土红色筒式水缸，就是在露天烧制而成。

这种先进的制陶手工艺分工细密，有的选择黏性适度、泥质较细的陶土，有的用陶土捏塑成锅碗瓢盆的粗坯，然后打磨光滑，有的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成型的器皿上描绘圆点纹、草叶纹、漩涡纹、曲折纹。这些能工巧匠中有一位忽然激动起来，在弧形的陶土上雕出一条有龙形图案的横子，套上另一块陶坯进行压模，然后放在严密的窑室里烧制。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一件长江流域独创的、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夔龙陶盘诞生了！

当我唤回思绪，不由为生养自己的土地自豪。要知道，那个时代，好多地方的人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汤家岗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已经既讲究实用又讲究美观。

下午，我登上横亘湘鄂的黄山大顶，找到了曾参加汤家岗考古发掘的老周。老周神采飞扬，语气激越地回忆往事。说到动情处，他找出一份《考古学报》指给笔者看，那上面的文章论证：占地几万平方米的汤家岗遗址，虽只发掘300平方米，就足以证实，它就是长江中游、洞庭湖区史前文明的一个摇篮。

如此看来，汤家岗的好戏还在后头。